

當作科學看的 歷史唯物論

康士坦丁諾夫著



人民出版社

當作科學看的 歷史唯物論

(『歷史唯物論』第一章)

康士坦丁諾夫著

沈 志 遠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書號：京1077

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

著者：康士坦丁諾夫
譯者：沈志遠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重印者：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一九五二年一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海重印二版

3,001-5,000

定價(甲1)人民幣4,700元

出版者說明

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於今年年初出版了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的集體著作『歷史唯物論』。這部著作出版之後，蘇聯的評論界予以很大的注意。各報刊發表的書評，就我們所見到的有以下各篇：歐庫洛夫的『評「歷史唯物論」』（原文刊三月二十七日的『文學報』，譯文刊『新建設』第四卷第三期）；車斯諾柯夫等三人署名的『爲完整的歷史唯物論教科書而鬥爭』（原文刊八月三日『真理』報，譯文刊『新華月報』第四卷第五期）；柯爾涅葉夫等三人署名的『關於歷史唯物論的著作』（原文刊『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五期）。在莫斯科曾爲這部著作舉行了一次連續三日的討論會，參加會議的約有六百人。

所有的評論都肯定這本書有如下的優點：書中詳細敘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有關歷史唯物論各項基本問題的基本思想，並引證了大量的實際材料；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特徵，蘇聯社會與國家制度較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國家制度的優越性在書中佔據着顯著的地位；書中說明了日趨尖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揭穿了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批判了現代的資產

階級社會學說。

但評論者指出，這本書也包含着重要的缺點：對歷史唯物論發展上的列寧、斯大林階段解釋不充分，全書的結構欠完密，材料的敘述上缺乏應有的系統化和一貫性，有的章裏對某些理論問題的解說不深刻，有的重複，有的略而不詳（如書中缺少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專章），語言貧乏等等。

我們認為，這本書對於中國的讀者還是很有用的，所以決定把它譯出來。由於這本書在結構上「很像一本論文選集，而不像一本統一的完整的著作」（車斯諾柯夫等論文內的評語），每章都可當獨立的論文看，所以採取分章出單行本的辦法。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

前言

一本系統地敘述歷史唯物論的書籍的需要老早就成熟了。高等學校的學生和教員以及許多獨立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科學基礎的蘇聯知識分子幹部都需要這種書籍。

爲讀者所需要的這部書是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集體寫成的，它試圖對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作出比較全面的說明。集體的作者在康士坦丁諾夫教授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達數年之久才寫成本書。書中各章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間曾在科學院哲學研究院的歷史唯物論部經過反覆討論，並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員和哲學教員參加。全書曾在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內經過討論，有莫斯科的哲學界參加。

寫作本書時，各位作者都是以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爲指導原則，它總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它的敵人近百年來鬥爭的歷史和我們時代的歷史經驗；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著作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發展的最高階段。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對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之檢驗，是它的

偉大的勝利。

在我們的時代，若不說明社會學的規律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如何表現，便不能說明關於社會發展一切形態的一般的社會學的規律。因此，本書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說明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

完全意識到：各位作者雖然力求本書的敘述接近於教科書的形式，但是還沒有達到學生所需要的敘述的簡明、扼要，形式的精鍊。各位作者和哲學研究院希望讀者給予認真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建議，以便幫助本書的修改。

第一、二、三、四、五、七、十三、十四、十五和十七等章是康士坦丁諾夫教授寫的；第六、九、十、十八等章和第十六章的一部分是哲學博士格列則爾曼寫的；第八章是加克教授寫的；第十一章是哲學博士卡瑪里寫的；第十二章是哲學學士赫魯士托夫寫的；第十六章是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尤金寫的。格列則爾曼曾參加本書的付印準備工作和編輯工作。巴威爾金在準備付印原稿上給予幫助很大。

作者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於莫斯科

蘇聯關於「歷史唯物論」一書討論的總結（摘要）

人民日報編者按：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集體著作、康斯坦丁諾夫教授主編的「歷史唯物論」一書的出版，引起了蘇聯學術界的重視。「真理報」、「文學報」和「布爾什維克」雜誌都有過評論，「真理報」和「文學報」的評論並已先後譯成了中文（前者見一九五一年九月號「新華月報」，後者見「新建設」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五一年第四期的「哲學問題」上又刊載了普列霍夫和米哈伊洛夫關於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科學家之宮哲學部擴大學術會議的報告。這次會議到了六百人，討論了三天，對這本書提出了很多意見；這本書的主編者大部分接受了出席會議各同志的意見，在會上也作過若干答辯。這次會議和這篇報告又都有總結性的意義。這本書的中譯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分章出單行本（現已出版以下五冊：「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生產的三個特點」，「從原始公社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現在我們把這篇報告的要點摘譯在這裏。凡已有譯文的從簡。

出席會議的同志指出，「歷史唯物論」一書的優點是在書中探討了許多反映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新的規律性的問題，作者在說明理論問題時依據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尤其是依據了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一著作。作者在說明具體問題時，敘述了歷史唯物論發展中的列寧、斯大林階段的特徵；作者總結了豐富的理論材料，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分出很大的篇幅，並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一般規律的作用怎樣改變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產生了那些發展的新的規律和新的動力，在書中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較資本主義

社會制度的無比的優越性。

讀者在書中可以找到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爲資本主義辯護的帝國主義反動派的走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侵略政策、資本主義各國的瘋狂的軍備競爭和英美帝國主義集團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企圖，極其詳盡的批判。

「歷史唯物論」的作者，一方面揭露了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敵對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反動實質，同時創作了貫徹着布爾什維克黨性精神和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的著作。作者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對某些理論問題作了創造性的論述。

但是這一本書基本上是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範例發表之前寫的，因斯大林這一著作的出版，在作者面前就提出了極其重要和極其複雜的任務：在書中要根據斯大林的新的著作的觀點，來說明歷史唯物論的各個問題，尤其是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問題，並要說明作爲一種社會現象的語言的特徵。

討論會上指出作者沒有完全執行這個任務。本書集體寫作者不善於在短期內基本上重新改作已準備好了的作品，利用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所提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最新成就。出席會議的同志們完全正確地批判了「歷史唯物論」的作者，因爲作者沒有用整章來闡明基礎和上層建築——歷史唯物論的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作者沒有揭示也沒有說明舊的資產階級的基礎和舊的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的更替及新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和適合於這個基礎的新的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的創造的規律性，作者僅停留在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最一般的辭句上面。

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中，提出了許多新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些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提高到新的、最高的階段。斯大林指示說，在分析社會生活時，不只是要揭示一般的東西，而且更要揭示那種對於每個社會現象特有的、專有的、爲每一個社會現象之特徵的東西。使社會現象區別開來的專門特徵，對於科學是最最重要的。作者應該把斯大林的這個指示作爲分析社會現象各個方面的基礎；但是，對於這個指示，作者只是在分析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階級鬥爭和革命的規律性時才應用。作者應該從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出發，來解決科學和藝術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斯大林所提供的作爲一種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新的定義，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意義。然而所有這些最重要的問題，在本書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闡釋。所以大部分出席的同志堅持要求在歷史唯物論的書籍中要加入重要的補充，尤其是要加入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專章，在這一章中要儘可能廣泛地把包含在斯大林各著作中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個最重要問題的取之不竭的豐富思想，揭示和指出。

發言的同志認爲本書的第二個大缺點，是對於許多時事問題發揮得不够。在涉及人民民主國家的發展問題時，本書作者只限於說明最一般的原則。作者對於中國人民革命現階段的特徵也沒有作充分詳盡的說明。作者在第九章「論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第二節末斷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了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革命的民主專制。這種定義沒有完全正確地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真正人民的和民主的政權）的特色和專有特點。斯大林同志曾經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建立某種類似於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革命的民主專政。

作者不注意新中國所實行的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雖然這個方面在敘述中華人民

共和國發展的特點時是不應該放過的。

出席會議的同志也指出了在歷史唯物論中應該較詳細地說明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改良和革命的相互關係問題的提法和解決。不管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和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飛躍問題、突變問題和逐漸發展問題直接聯系着的，在本書中顯然是說得不够充分的。革命政權所執行的改良，其作用是特別大的。作者既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在這方面就不只是要分析一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且也要分析一下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驗。這在政治方面和理論方面是一個特別崇高的任務。

這本書的另一個缺點是沒有充分揭示兩個陣營——民主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在戰後時期鬥爭的實質。在本書中只說明兩個陣營鬥爭的最一般的特徵；但是每一個人都了解，現代社會發展的問題，是不能脫離各民族爲和平、民主及各民族獨立的鬥爭來考察的。

作者沒有充分指出共產主義力量的增加，沒有充分揭示出共產黨影響增長的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出席會議的同志也正確地指出，本書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批判所提供的，主要是先前各個時代的材料，而對於英、法、美各國所流行的現代資產階級的理論，批判得非常薄弱無力；而揭露現代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包括英美帝國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右翼社會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有許多同志批評第九章「論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較爲詳細地說明蘇維埃國家的問題。例如作者在說明列寧和斯大林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及其作用的想法時，爲什麼完全放過

不談蘇維埃國家如何爲和平而鬥爭的問題。而實則在現時的條件下，當蘇聯的威力及其威信在解決國際問題中無限增長，蘇維埃國家已成了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蘇維埃國家爲爭取和平的鬥爭，獲得了全世界歷史性的意義了。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論原則，具有特別的現實性，因此這個問題必須分出專節來討論，而不是像本書作者所作的那樣（見第九章第五節及最末一節）限於幾行敷衍式的答覆。

同志們指出第九章所提供的蘇維埃法律的定義，使法律和道德等同起來。因爲道德的定義是「蘇維埃人行爲規範的總和」，而本書中法律的定義是「規範（行爲的規則）的總和」。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顯然是因爲沒有批判地對待通常法律教科書中的定義，例如「蘇維埃國家與法律原理」教本中就有類似的定義。在法律的定義中，首先要提出的，不是行爲的規範，而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法規的總和，因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法規規定着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各個成員的權利和義務。

在第十一章「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中也有嚴重的缺點。

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蘇聯社會主義民族的繁榮，在本書中指出的，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確實的理論上的總結，必須以社會主義民族形成過程的分析來支持。而且在這章中某些理論問題的說明有點抽象和學院式的，是脫離激動着世界輿論的那些尖銳的問題的。東方各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解放鬥爭、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全世界各民族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囂張地宣傳着的民族主義、世界主義、種族主義的鬥爭，——所有這些重要的問題，在本章中都沒有得到應有的說明。

我們自然不能要求作者詳盡地分析我們現時的民族殖民地運動，但是在舊書中必須指出社會發展階段民族殖民地運動發展的一定的規律性。

作者在本章之末，把中國放到殖民地國家中去了，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大家知道，中國從來不是殖民地，而且在本書出版之前早已不再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了。

在這一章中，關於某些國家發展的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問題，沒有完全解決，而大家知道，這個問題時有特別的現實性。

本書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性的說明有重要的缺點：說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特徵的極為豐富的資料，在許多地方解說得太簡略。

例如在第十七章「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中，作者說到蘇維埃社會道德政治的統一、各民族間的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批評和自我批評。作者的功績是指出了這些新的動力的基礎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之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但是關於這些動力如何起作用 and 它們表現在那裏的問題，仍舊沒有完全揭示。作者把大部分的注意放在證明這種動力是存在着的和它們只有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才能出現的這種論證上；作者證明，在分裂為敵對的、互相對立的階級的資產階級社會中是不可能具有這種動力的，而僅限於這些無可爭辯的原則的證明中。作者因為僅限於公式化的陳述，因此沒有具體地分析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新的動力的作用。

在論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的幾章中，沒有關於綜合機械化的特徵的說明；而綜合機械化是和資本主義不同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特點之一，因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具有綜合的機械化的。

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一章中，關於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的基礎問題沒有充分的發揮。本書作者一再引證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完全適合的有名的公式，但是沒有充分詳盡地揭示出這個最重要的原則，雖然這個原則對於解決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許多理論問題，尤其是像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問題，沒有爆炸的飛躍問題等等，具有巨大的意義。

許多同志在討論時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關於過渡的生產關係的問題。這幾位同志在批評本書的觀點時着重指出，我國過渡的生產關係不應在萌芽的諸成分中去找，而應在社會經濟所有成分的相互關係中去找。作者之所以受到批評，也因為把合作的最初形態，例如共耕社，當做過渡的生產關係，而所根據的理由是說這些經濟形態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但是提出批評的同志沒有注意到，合作社，雖然無可爭辯地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但是在其最初的形態中（供銷合作化）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生產關係，只有建立在集體農場的基礎上的生產合作化，才表示最根本本地改變了小商品經濟的生產關係。

另一些同志又指出了一個重要缺點，即歷史過程的理論，在書中說明的差不多只是根據西歐的材料。例如在說到奴隸制的和封建制的生產關係時（第四章第二節和第三節），本書作者只說明西歐各國從奴隸制度過渡到封建制度的問題，俄羅斯在這幾節中只提了一提，而拜占庭、中國、印度、阿剌伯國家則一點都沒有說起，而且作者把奴隸所有制關係和封建關係當作某種早已過去了的東西來看待。當說到奴隸制度時，作者提到古代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烏拉爾圖國家〔註〕等等，但是一句都沒有說到例如美國的奴隸所有制關係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在書中也沒有說到，在許多殖民地國家中，現時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加緊支持和扶植奴隸制度。

作者也沒有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許多封建主義的殘餘，例如在美國這些殘餘現在還是非常濃厚。在本書中沒有說起封建殘餘還支配着印度、日本及某些其他國家的農業，而消滅這些封建殘餘將是這些國家革命的中心任務之一。本書中也沒有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是怎樣消滅封建關係的。

在討論這些問題的進程中，有些同志指出在書中必須總結東方各國歷史的材料，並從而表明歷史唯物論乃是一種總結各民族歷史經驗的理論。

最後出席會議的同志指出了本書結構上的缺點，即各章之間沒有邏輯的聯系。本書的文體也必須加工，許多同志舉出許多敘述不成功或定義不確切的例子，許多地方重複的例子。

本書的廣泛的討論和全面的具有原則性的布爾什維克的批判，將幫助作者創作能滿足現代科學要求的教本。不用說，這樣的教本的需要，是非常非常迫切的。（馮維靜摘譯）

〔原刊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註〕烏拉爾圖（Urartu）是公元前一千零九年居於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上游的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為資產階級的歷史書所不載；但是在研究古代史上它是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詳見潘克拉托娃主編的「蘇聯通史」第一卷第二章。得斯大林獎金、阿武基也夫的「古代東方史」中也有專章研究。——譯者。

目 錄

一 歷史唯物論的對象·····	一
二 歷史唯物論的建立是科學中最偉大的革命·····	七
歷史唯物論建立以前唯心論在社會學和史學中的不可分割的統治(七)——發見社會發展規律性的一些初步嘗試(二六)——歷史唯物論的發生(二〇)——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統一(二四)	
三 歷史唯物論關於社會發展的規律·····	二七
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是它的精神生活形成的根源、政治制度發生的根源(二七)——基礎和上層建築(二七)——社會的歷史是人民羣衆的歷史(三三)——社會發展是一種有規律性的過程(三六)——不容許社會規律跟自然規律等同起來(四三)——社會經濟形態(四三)——一般的和特殊的歷史規律(四六)	
四 歷史的規律性與人的自覺活動·····	四九
社會發展是自然歷史的過程(四九)——社會的發展是通過人們的積極活動而實現的(五一)	

——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三)

五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破產·····	五
六	列寧和斯大林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發展·····	六
七	歷史唯物論的黨性·····	七